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铁窗岁月】	监狱里的杨首席	张郎郎
【春秋史笔】	吴晗——不止是个人的悲哀	刁仁德
【史实辨析】	关于翦伯赞之死的两种叙述	王渊涛·史客儿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九）	王复兴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铁窗岁月】

监狱里的杨首席

• 张郎郎 •

一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家庄市河北省第二监狱。在此之前，我先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看守所练了三年闷功。然后，转移到河北饶阳县大狱，又在那里练了三年饿功。六年之后的1974年，我才算熬出头儿，从死刑未决犯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还带个“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尾巴。剥夺不剥夺，对我没意义，说来可笑，我们这种人还有值得被剥夺的权利么？

对一个死里逃生的未决犯来说，能当个堂堂正正的劳改犯，已经是一步登天。更何况，我将要去的中队，牛啊。要来这儿有条件：必须是死缓、无期或至少十五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来者必须身怀绝技，能说能干、手脚利索，不收等闲之辈。

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人员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办公室，警官抬头看了看我，对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犯人说：“小王，你们给他松开。”那个小王忙上来给我松绑，一边解绳子一边说：“嘿，哪儿是绑人呢，简直是勒猪啊。这么虐待犯人，你可以告他们。”队长一边看判决书，一边笑着说：“你少说两句吧。”我一言不发，心想：这小王胆子也忒大了，跟队长怎么说话呢？这六年里，从没见过犯人当着警察敢这么放话，更没想到警官居然没抽他、没骂他，还笑着和他有问有答。

哦，看来这儿的犯人已经从地狱最底层上升了至少一个台阶。这里的游戏规则和看守所完全不一样了，我不由得暗自心花怒放。

队长看完我的卷宗，轻轻哼一声：“还是个大大学生呢。你们把他送到零修组去。”所谓零修的意思就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重大的恩

典。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省公安厅管，专为公安系统服务。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荒诞，有点儿悬。其实细一想你就明白了——这些重刑犯个个都趴在生死边缘的刀刃上。当年，饶阳县看守所的张所长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如今能让你们修车，能不精益求精么？

跟我一样因“反动言论罪”进来的杨秉荪可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判了十年，少了一个“重刑犯”的必要条件，就进不了零修组。来之前，他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可监狱里不管这个，给他分到了施工队。重体力活儿啊。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员的手，用来搬运水泥墩子、水泥块儿——纯属暴殄天物。

他们哪儿知道杨秉荪不同凡响的来历呢。

## 二

杨秉荪在红色摇篮里度过了童年。他是个孤儿，在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小学里长大。他是个音乐天才，陶行知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伯乐，特意请马思聪先生、黎国荃先生来指教小杨秉荪们的音乐课。

那个学校有很多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有人说，这个学校相当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儿童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常到这个学校去看望这些成长中的孤儿，杨秉荪等几个尖子学生都把周伯伯当成自己的父亲，周恩来也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杨秉荪20岁，新中国建立。1950年他随中国第一个青年艺术代表团，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去巡回演出，走到哪儿轰动到哪儿。谁会想到，新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能有这种水平？后来，团中几位佼佼者去柏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杨秉荪的小提琴和后来成为他妻子邬滴丽的钢琴都成功为祖国争了光，拿到了金奖。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几位青年艺术尖子留在苏联留学，杨秉荪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又被送去匈牙利深造。回国后，他自然就分到当时中国最牛的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从工作到1966年，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小提琴练习。小提琴是他事业的根基，是他迷倒众人的魔棒，是他人生征途上的贴身利器。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交响乐《沙家浜》还没上演之前，西洋乐器和它们的主人们，统统都被打翻在地，还踏上无产阶级的无数只大脚。

可杨秉荪依然在偷偷地练琴，把指法与运弓分开来，不让琴发出声音。无独有偶，被打断手指的钢琴家刘诗昆，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他把窗台当作钢琴的键盘。那是一个无声音乐流行的年代。

在“抓出造谣坏人”的一声令下，老杨和我还有成百上千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各个公安机关。这时候，他才第一次不得不和他的小提琴一刀两断。

说来有趣，我和杨秉荪并不是头一次同监，在饶阳看守所我们就是狱友。他曾经给我讲述在匈牙利受到的震撼。1956年的一天清晨，苏联坦克轰轰隆隆开入了布达佩斯，一辆辆战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大地都在颤抖。匈牙利人居然还有零星抵抗，苏军坦克就开炮回击

了。老杨住的对面是座五层大楼，炮声一响，这座大楼的一整面墙就咔嚓地垮了下来，似乎是被巨人抽掉了朝向街面的墙，眼前的大楼立刻变成了一台布景。家家依然布置得整齐舒适、井然有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一架斯坦威钢琴。他站在窗口，惊愕，惊讶，惊叹！当年，全北京只有一架德国制的斯坦威钢琴，还相当老旧。在当时，那可是国宝级的稀罕物啦。

老杨如今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那儿教孩子们拉提琴。如果不是他当年在监狱里告诉我，布达佩斯不可思议的文化景观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现在斯坦威钢琴（无论是美国产的还是德国产的）如烂漫山花遍布中国大地，那年头儿谁都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 三

1975年，杨秉荪的天时到了。邓小平已经出山，全国都在恢复调整中，监狱里的气氛也相应好转。地利呢？就是二监是大城市里的一个大型企业，相对稳定，有发展空间。人和呢？我们的费典狱长喜欢读书，还喜欢文艺。他想要让单位气氛焕然一新，把改造思想的灵魂医院推上一层台阶。再说，那时费狱长也想趁机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拼一拼，在劳改系统创出一条新路。

于是，费狱长一声令下，让每个中队都得准备新年文艺节目，优秀节目还可算是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各大队和中队摩拳擦掌，挖掘文艺方面的潜在人才。从艺术团体扭送来的“现行反革命”，原先根本没人待见，觉得这些人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全是废物点心。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些人顿时变成香饽饽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手小左、中央乐团的男高音小王、电影学院的三位青年教师、中央芭蕾舞团的小丁、中国京剧院的小齐等等，差不多都是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时期抓出来各大案的案犯，有的是“造谣者”，有的是“传谣者”，还有写错标语的，喊错口号的，原来分布在各个不同狱所，这时期从采石场的山沟里，从铸造厂大炉边，从青纱帐的玉米地里一个一个个被选拔回来，开始发光发热。

中队为了让杨秉荪表演好这个节目，让他写信给前妻邬漪丽，请她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可队长听说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当场就傻了眼，于是，狱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专程到北京去取。

邬漪丽是祖籍上海的华侨，当她听说老杨栽进一个大案时，立马吓蒙了。当时中央乐团被称为“样板团”，邬女士不得不赶紧找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再找法院申请离婚。老杨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干净一麻利一脆就签了。绝对没哽没泪。人家那是什么层次的主儿啊？

邬女士与丈夫办了离婚，保住了政治生命和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同时，她也满腹心酸，为杨秉荪的突变不幸而难过惋惜，也为他们过去共同的日子伤感万分。如今，他人在监狱，老杨的东西就封存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包括那把贵重的小提琴。

二监派去北京的几位队长，到底都是公安战线的老将。几经周折，总算把这把珍贵的琴全须全尾带回了石家庄。当费狱长把这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就双手发颤，那

脸上的表情更难以形容，无法描述。仿佛他捧过来的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个“十世单传的婴儿”。

#### 四

这是我入二监狱后的第一个新年联欢会，我亲眼见到老杨如何乌鸦变凤凰。

一曲《新疆之春》独奏，把六千多男女重刑犯全都镇晕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仙乐岂凡罪人听？

你想，他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过去在北京要听他们演奏的交响乐买张票都难，要是古典名曲，更就难上加难了。不但票价高，而且一票难求，所有想听的人，得到东单售票处领号，彻夜排队。北京人那会儿有这么个说法：“砸锅卖铁弄一耳朵贝多芬。”

他的小提琴高水平表演，在二监狱真有点牡丹花喂牛的意思：五湖四海的犯人哪儿品得出这等芬芳？不过，这曲子以新疆民歌为主旋律，至少听着耳熟，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再说，他们此前不大明白小提琴为何物，这回算是开眼了，也看明白了，用脖子夹着，拉出来这么个速度，这么个旋律，再弄出这么个响动——实在太不容易了。

随着《新疆之春》旋律的余音，“杨秉荪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老杨的琴声而屈尊“入狱”，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联欢晚会。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们，有“支左”军队的首长们，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下子，杨秉荪鸟枪换炮，咸鱼翻身了！大队部想把他调到别的中队去，可建筑队的主管觉得天上掉下来这么个活宝，对所有要求一致回答：“没门儿！”

过去，他们让杨秉荪天天浇筑水泥块儿，把他累成了椎间盘突出，疼起来坐不起来、躺不下去，只能整夜趴在床上。如今，他们死活都不让他再去干这种累活了。先把他送到二监狱的医院里，理疗、推拿、拔罐子，中西合璧全活儿，让他好好恢复。平时就让他干点轻活儿，剩下的时间还让他练琴。每个星期他还有机会坐着队长的吉普车出监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他不但放了个大风，也得了点儿口福。

198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影片奖。片子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这片子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更值得一看，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熟人杨秉荪。他和我都是1977下半年被释放出狱的。他回到中央乐团，人们大吃一惊，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后，他的手艺居然没丢。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来中国，老杨是主要接待人员之一。首先因为他是中央乐团的副团长，是首席的小提琴家；更实际的原因是，在这些演奏员中他的外语最好。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斯特恩先生和乐团一起排练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杨秉荪就坐在乐团第一小提琴手的位子上。你可以看见，他给斯特恩先生当翻译，向同事们解释其要求和意图。他还陪着斯特恩先生参观、访问、和学生们交谈。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这部片子会有几次让人感动得眼圈阵阵发红。

有一回，我跟狱友老易聊起老杨境遇的变化。老易说：这事儿和中彩一样，没准儿。前两年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听到如此高水平的小提琴现场演奏呢，谁承想这么快就能听到杨秉荪本人的现场演奏。这也是一种运气，一种意外的福气。

我说，就是就是。估计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犯人们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亲耳听到刘秉义的男高音演唱；关在河北深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犯人也没想到，这辈子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英若诚的《茶馆》片断现场表演。你说得不错，这也是一种缘分哪。

这么想来，那年头儿蹲蹲监狱真没什么不好。一来可能你躲过了不少意外之灾。二来每次监狱调动，你永远猜不到，下次你有机会见到谁。众多人物如果不进监狱，也许你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

杨秉荪后来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在那教孩子们拉提琴。谁会想到，四十年前，他和我一起石家庄河北第二监狱里当劳改犯呢。

□ 原载《财新周刊》2016年第16期

~~~~~

### 【春秋史笔】

吴晗——不止是个人的悲哀

· 刁仁德 ·

回忆“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远无法绕过，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革”序幕由此拉开，不久无数官员与知识分子厄运降临，但第一个遭开刀祭坛的人物，自然是《海瑞罢官》的作者——集官学于一身的吴晗。

吴晗不仅是《海瑞罢官》的作者，还是钦定“三家村”的黑帮分子。对于厄运突然降临，不仅令吴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轰顶、十分意外，就连吴晗的朋友也感难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后，吴晗曾是为数不多的可出入毛泽东书房的明史专家。1965年又是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在接受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指示修改后，重新出版的一年。

吴晗的遭遇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开“文革”序幕之前，毛泽东已确定的斗争目标中，吴晗还远远不够格，但为什么要选择先拿下吴晗开第一刀？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先拿吴晗开刀，其实是为敲打1959年在庐山被罢官的彭德怀，而敲打彭德怀，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发奇想，提出干部应学习明代海瑞“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精神。不久，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将此重要信息转告吴晗，这对于步步紧跟的吴晗而言，正是又一次重要机遇，岂能轻易放过。此后，吴晗接二连三地写出“海瑞的故事”、“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发表在中共顶级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上。1960年，意犹未尽的吴晗又编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时的吴晗正值春风得意，完全未意识到自己的头颅正钻进一根已悄悄收紧的绞索，甚至连著名京剧艺人马连良，因应吴晗之邀在剧中饰演海瑞，也在1966年惨遭横祸送了老命。

1959年是新中国暴发大饥荒的第一年，吴晗的步步紧跟，其实并非从这一年开始。吴晗的夫人袁震，早就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吴此后的命运也由此决定。在西南联大时期，吴晗就已明确选中紧跟的目标，并以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作为进身的资本。

易杜强（美）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书中，称吴晗：“当他（在讲台旁）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同在此书内，作者又指出：“吴晗专攻明史。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脏枉法……，这一切与蒋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吴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紧跟红色政权的左翼人士，这在崇尚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多见，除吴晗外还有一人是闻一多。

吴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个时代，文化人由学而官的典范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吴晗。1948年，吴晗由民盟的身份，成为代表新政权掌控北大、清华的接受大员。随着北京和平解放，吴晗又荣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的副手。在以后的几年内，借用岳南在《南渡北归》一书中的点评，吴晗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950年代前期，吴晗作为权力在握的官方大员，在北京城区的建设规划上，与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发生冲突。梁、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北京老城区传统的文化建筑（包括牌楼、城门等），建议另建新城区，与老城区形成“日月同辉”的格局。建筑学家的良苦用心与真知灼见，彭真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可能难以理解，但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也不理解，是讲不过去的。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梁、林与吴晗的冲突，已完全毋须再作分析与评论。当年林徽因拖着病躯指着吴晗痛斥，并声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这里”时，当事人并没有想到，后人对林徽因产生多么强烈的敬仰，而对吴晗至多也就是不屑了。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吴晗步步“紧跟”的行为方式更令人深思。在民盟中央面对面批判钦定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的大会上，同为民盟要员的吴晗，作了“我愤怒！我控诉！”的重量级发言。吴晗的批判发言锋芒毕露，声色俱厉句句见血，必欲致章、罗于死地而后快的冷漠与坚定，令人不寒而栗。黄裳先生曾在《读书》上著文回忆此事，文中谈到：

1957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其中有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是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桥疗养院所得。

在关键时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诸于众，并如此横加激烈的鞭鞑批判，吴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赶尽杀绝的坚决态度，比起9年后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对他自己的批判，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朝骨子里看，姚文元其实仅仅是吴晗第二。吴晗与姚文元的区别仅仅在于：一、吴晗打击目标所指，全限于知识界；而姚文元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政府高层（无产阶级的高级干部）。当然这个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他们二人自己，他们只是察颜观色、奉命执行而已；二是官方对他们身后的评价也有很大差异——吴晗在“文革”结束后获第一批平反并恢复名誉，而姚文元在此前不久，即被钉在“四人帮”的耻辱柱上。毛泽东去世后的执政者对吴、姚的不同处置，完全与毛泽东相反，此一点同样耐人寻味。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对吴晗而言，是丧钟。不久，吴晗遭红卫兵抄家，又被红卫兵绑在树上用皮带抽打，头发被拉光，脖子里被灌入热沙子，鲜血顺裤管流下，之后又被正式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受尽人间地狱的折磨，其妻及一子一女也先后遭迫害致死。

而8年前被吴晗往死里整的罗隆基，虽被打成“右派”，却能“死不投降”；虽被撤掉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官职，却有幸未被关押秦城监狱，也没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更未遭红卫兵的侮辱、批斗和毒打，甚至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还居住在北京迺兹府宽敞的公馆里，还能有老朋友看望、聚会和聊天，甚至聊天中还能大胆表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

1965年12月7日深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平静地离开这个人世，此时正值吴晗的丧钟敲响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吴晗与罗隆基大相径庭的结局，吴晗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吴晗在屈死前，对自己以往为政治而学术的伪学者习气，对自己因“紧跟”而落井下石的种种卑劣行为是否后悔，我们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即如果吴晗没有为“紧跟”而对罗隆基落井下石、没有为“紧跟”而大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与海瑞戏，也不会沦为“文革”一开始即遭开刀祭坛的人物。在中国，一个读书人绝不可能左右社会制度，但个人的行为方式却可由自己选择。吴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劣迹，吴晗在1957年对“章罗联盟”的残忍杀伐，在一定程度也是对自己的伤害。中国人从前常说的“因果报应”，似乎在吴晗的身上获得验证。

“文革”结束后，吴晗似乎又一次获得回报——除最早获平反及恢复名誉，官方在清华大学近春园的荷塘旁还修建了“晗亭”，这对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种安抚或补偿，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做给活人看的。知识界好象也不甘落后，我所见的文字中，就有人称吴晗的“品质永垂青史”、“人民永远怀念他”，甚至有中年的历史学博士生在文中称之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很显然，如此捕风捉影的廉价赞扬，其实是刻意回避历史的结果。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于，吴晗的棍子与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显区别——吴晗的棍子专打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在我看来，清华园内的那个“晗亭”，最终将成为对落井下石一类知识分子的嘲讽。

几年前我阅读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的“结语”中有一段文字是：“本书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们遭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进一步的羞辱，并为南京数十万受害者的无名坟墓奉献我写的墓志铭。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探索。”这里所谓“人类本性阴暗面”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至令张纯如欲说又止。

张纯如自杀前对身边亲友的一句话对此作了解答，她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

作为华裔人士的张纯如，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心头也滴着血，但作为学者她又不能不说出真话。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吴晗，是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吴晗，是急于自相残害最终又自掘坟墓的吴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的帮助，但却是奴性十足的吴晗。

吴晗的悲哀，不止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悲哀；而对吴晗的赞誉，则显示出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愚昧与无知。

~~~~~

## 【史实辨析】

### 关于翦伯赞之死的两种叙述

• 王渊涛 • 史客儿 •

#### ◆ 王渊涛：我亲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我是1964年从福建考入北大历史系，到校后新生体检复查时，发现得了肺结核病必需休学，第二年经复查可以复学，这样就转入65级。

64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呆了一个多月，因此对64级的同学已多认识，对当时的系领导和教师也有所了解，知道当时历史系有一正两付系主任，翦先生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景仰的学者。

在65年的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翦先生，不记得他是否给我们这些新生什么教诲，以后就再没见过他。1966年春节过后，历史系到昌平县的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在太平庄的一个后来既当食堂又当资料室还当会议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举行了一个动员会，到会有邓拓，三个多月后他就自杀身亡，有陆平和彭佩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没记住他讲了什么，会后他就走了，长驻太平庄的是张芝联先生，他还给我们一年级的八个人上法语，而此前教历史和国政两系十六个学生法语的是刘自强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丈夫梅祖彦当时在清华任教。

在65级学生入学前后，中国的文史哲经、文学艺术各界已是山雨欲来。对翦先生的史学观点的批判其实已经开始。1965年12月8日，被毛泽东主席加封为三大权威之一的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十三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长文，矛头直指翦伯赞，锋芒毕露批判先生所讲过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作为刚上大学的我们，只当是学术讨论，并没有闻出其间浓烈的火药味。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太平庄半工半读和高年级还在搞四清的历史系师生，都返回校内，在运动爆发后高潮期的各种斗争会上，我从未参加过对翦先生的各种批斗会，也从未参加过他的专案组或监视过他。这样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的1968年秋。

1968年11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因本人不写日记，具体日期回忆不起来了，后文除了有确切日期，其余都是大约），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李杰（他当时负责对历史系员工的专案工作，后来听说以泄露审查对象的案情向审查对象索取财物，在审查他时自杀身亡，不由感慨进驻北大管大学害了他）。突然把我和64级的胡敬梁召到他设在38斋一楼的办公室，说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要我们两人配合他们工作。叫我们马上到小东门去等他们，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李杰）汇报。至于我们是否以翦伯赞专案组名义活动，根本就没有涉及。此时离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已四个月，他们已完全掌控了北大文革的所有活动，根本就不是有些资料所说的是私自组成的什么专案组，人员也始终就是两个。

我俩马上赶往小东门（现已不存，当年去清华都从这门进出），不久来了一部小轿车，在门卫那里下来个军人，自我介绍是刘王专案组的，名巫中。我们告诉他是系工宣队让我们配合他们工作，就上车开往燕南园。车上并无交谈，当时正逢中央要对刘少奇做政治结论，刘王专案组的名气让我们十分拘紧。车上除了司机，他们只有两人。巫中很显然是负责人。他年龄约45左右，身体不高但壮实，很有军人的肃杀决伐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到翦家，后来知道是燕南园64号，走廊进门，外间是护工住房（有很多材料说护工姓杜），护工不管来人谈什么，只负责登记来访者的单位、名字和到访的时间起讫。里间是翦先生夫妇寝室。谈话基本上都是在里间进行，也基本上是在巫中和翦先生之间进行。巫中倒也没有声嘶力竭，更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把手抢掏出拍桌子。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翦参予的为国共双方进行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连的一些人物。尽管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但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只记得问到谌小岑，吕振羽几个名字，我们根本插不上话，整个过程只有听的份了。根据后来有些资料所说，这一天应该是十一月廿二日下午。这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先生守口如瓶，审问呈胶着状态，每次巫中来时，会通知我和胡二人前往翦宅，巫中不来，我们根本不会去单独审问，因为对发生在西事变之前这段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历史，当时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到。

大约到十二月初，巫中要我们去查看翦的档案，想从中寻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到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翦的档案已摊开在一张大桌子上，份数挺多，也很零乱，我不知是否先前有人来翻阅过。突然有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信是50年代肃反时写给北大的，没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要点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在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黑很粗糙……

发现了这封信，我仔细看了两遍，当时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一是这女子写信的动机何为？二是以翦的身份，档案中居然有这么个定时炸弹装在里面十多年。三是凭直觉，我对信中所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怀疑。尽管这段历史我在几十年后才有了了解，曾养甫的名字当时也根本没有听过。几十年后我才看到有关资料，知道这一段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是从1935年11月就开始的，一直到1936年9月，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处长兼新路建设委员长，受陈立夫密令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1935年12月，曾养甫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中央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他以国民党方面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

我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我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我们告诉他有这么一封信，他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拍了数份后再来北大，并给我们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先生了。这次巫中态度强硬，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写出材料交给我们。然后和我们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进行隔离监护。但是系工宣队也许是不买账，也许是怕麻烦，并没有采取监护措施。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们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二张多约有千把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翦先生的亲笔字，字写得很认真，但不漂亮，心里还想：大学者字不怎么样。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他仍然推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己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她结婚成家，就断了来往。我和胡敬梁看完材料就准备带着材料离开，翦先生随我们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我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我们宽慰他：会的，毛主席在中央全会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根据后来有人查对了翦家的来访登记，这应该是12月16日下午的事。

12月18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我们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意，陪同他们又去翦家中，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可以证明翦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说：我的手就怎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很久，气氛紧张。19日，系里就传出翦夫妇自杀的消息了。对他们后事的处理等等，我们都是后来听说的。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时间，系工宣队有一天上午通知我和胡敬梁去哲学楼某号房，我们遵命前往，大房间里坐了很多，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开始传达中央关于翦先生自杀事件的会议精神，会议由汪东兴和谢富治主持，十分严厉批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训斥他要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巫中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过错，在会上居然想把责任推给我们，无中生有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和谢说，学生也要做检查。开完会我们回到38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违心地承认没有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毛主席不忠云云，我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军宣队算过关了。1970年3月，我离开北大回南方工作，以后没人要我谈这段事，我也把它深藏在心里从不对人谈起，主要是因为涉及师长隐私。

这事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总会想起以前的种种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事，回忆文革绕不过翦先生之死，我总想，作为一个有十分丰富人生阅历又融通古今变通的学者，他已经挺过了三年多的磨难岁月，又得到最高权威的保护承诺，为何躲不过那劫？他在结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样权衡利害而感到劫数难逃？今天大陆的主流媒体和影视文学作品，对1935年11月开始的那场长达11个月的国共两党代表的会谈，已经给予十分正面的积极评价，被认为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作为参与者，难道那时真得认为罪不可赦？还是他自己年青时的个人隐私被泄露，让他感到无脸见人？凡此种种疑惑，经常在我脑中纠缠，引起思索。我想，这些问题，只有把它们置于文革那种惨烈的政治场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今年4月，一些北大同学聚会，我得知大学同班好友王复兴正在撰写他个人在北大文革的回忆录，其中要谈到翦伯赞夫妇在文革中双双含冤自杀的事，我把这段史实说给他们听，王复兴和在座的中文系学长马云龙都要我以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把这一段从未披露过的史实记载下来，才让我下决心把这段史实写下来，也纠正多年来一些不准确的说法。

2015年10月24日完稿

□ 本文曾以《我知道的翦伯赞之死》的标题全文刊发于2015年11月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 ※ ※ ※ ※ ※ ※

#### ◆ 史客儿：震惊中南海：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之谜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1965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96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

上午8时多，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老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

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1968年10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

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有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四十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实际上是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1968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佩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原来，1966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1966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1967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截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100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

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12月19日晚，天气极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12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21日上午8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毛泽东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 摘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九）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3 b，第六章 继续大乱的1968年）

### 9、武斗结束，工军宣队进校

7月28日，北大校文革发布了《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工军宣队立即夺了校文革的全部权力，掌控了北大。工军宣队总指挥是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副主任有魏秀如（女、第二机床厂工人）等6名工人。派到我们历史系的负责人是李杰（618军工厂工人）。领导我们历史系一年级的有三个工人。

8月20日，工军宣队召集两派代表开会，达成协议：两派须上缴武斗工具；拆除工事；互相停止攻击；宣传队接管两派广播站。

据《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记载：

8月20日，“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长矛930支、铁棍200根。

8月21日，“井冈山”上缴：长矛749支、铁棍71根、大型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枚（奇怪的是有子弹，没枪，但没追查。）

根据两派上缴的进攻性武斗工具推测，如有20%库存备用，80%在武斗人员手上，那么“公社”武斗人员有900人左右，“井冈山”武斗人员有700人左右。两派逍遥派共有10000人左右。武斗后期实际参加武斗的人数比上面估算的数字还要少，据“井冈山”武斗队员说，武斗后期“井冈山”坚守阵地仅有2、3百人左右。“公社”的武斗人员同样在后期骤减。北大绝大多数师生以逍遥方式抵制武斗，反对武斗

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仍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上层建筑领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此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之后，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包括大专院校师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边缘人物。

8月28日，“新北大公社”宣布解散。

8月29日，“井冈山”宣布解散。

9月3日，两派师生回归各系、各科、各年级、各班，实现大联合。各系各班由工军宣队派人领导。

领导我们历史系一年级的有三个工人，其中有一个20来岁女工，从来不讲话。我私管这个女工叫“黄毛丫头”。张文虎提醒我，“说话小心点，别乱叫，别找麻烦。”我的女友张敏告诉我，她所在西语系二年级英语班，来了个当兵的小排长当领导，20岁左右，样子是从农村参军不久。一次开班会，小排长批评有的同学偷偷学英语，说“中国人学外国话干什么？”张敏觉得挺好笑，偷偷告诉了我。

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全校各系各班每天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是向毛主席请示一天的革命工作应怎样做。晚汇报是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工作，反省有那些做的不够好。每天一早一晚，全班同学要在一起，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齐声诵读：“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无寿无疆！”然后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叫做共同学习。很像宗教仪式。大家还要抽空向工人师傅学习跳忠字舞。通过跳舞向毛主席表忠心，并通过跳舞培养忠于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在38楼下面，全班排队散开，跟着工人一

式一式地跳，像一群傻子。我在宿舍里说“搞这套形式主义干什么？”张文虎又马上提醒我：“你的嘴小心点，别乱讲！”对忠字舞，心里厌烦，可也不敢不学，不敢不跳呀！

## 10、弟弟复光遇害，悲痛欲绝

1968年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坐在家里院子（我每个周末骑车回家），门铃响，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我打开电报一看，不敢相信，电文只有五个字：“王复光死了。”电报是海南岛万宁县邮局发来的，不知何人所发，没有发电人。

此前在7月上旬、中旬，北京到处张贴着有关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武斗消息的大字报，标题有：“惨案报导”、“十万火急”、“血流成河”、“紧急号外”等等。父母有不祥予感，我每次回家，都催我写信让复光赶紧回北京。我连续发了两封“航空”，催他回京。后来干脆在7月底给他发了一个“母亲病危速回京”的电报，骗他回家。结果在8月上旬收到这么一封匿名回电。母亲一看电报，泪流满面。我不相信是真事。那时没手机，打长途也不知往那儿打（没号码）。只好往兴隆农场场部和所知的复光几个朋友处，发信了解情况。后来得知：在1968年8月2日深夜天没亮之前，兴隆农场以华侨知青为主的一派群众的宿舍区，突然被以农场老职工、基干民兵为主的另一派，武装包围。复光跑去军管会拍门报告，要军管制止武斗。军管会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于是复光又往回（宿舍方向）跑。对立派民兵队长郭际标高喊“站住！”复光继续跑，背后枪响，复光倒地，背后中枪，不久气绝身亡。天亮后，场部对立派大喇叭广播：“狗崽子王复光已被打死！”他的尸体和其他几个尸体一起被埋入一片荒地的大坑里。埋葬之前，他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复光去世，才年仅24岁。8月中，我在北京收到复光遇害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这时他已不在世了，他在信中说，“根本没法回家。海口的码头、口岸已被封锁，茫茫大海，我不可能游过去。”以前复光每次回京，都是从海口市乘渡轮过海峡，到湛江市坐火车回京。那时没人乘飞机，也没钱乘飞机。从复光最后给我的信，得知他已收到我7月中旬给他连发的两封信。我在信中曾叮嘱他千万不要参加武斗。也许正是这样的叮嘱反而害了他。他竟会天真地相信军管会，跑去军管会要求制止武斗。军管会为什么大门紧闭？敲门不开？里头的人应是早已知道要发生什么。此外，为什么封锁海口码头？谁封锁的？谁允许开枪的？8月2日在兴隆，在海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海南岛“8·2”惨案是场蓄意屠杀、镇压。至今这个惨案的内幕尚未被揭开并清算。

后来我了解到，在8月2日及以后的几天，兴隆农场还有群众被杀，包括老人、小孩，许多人被打。复光的好友、印度尼西亚华侨郑文泰就曾遭关押、毒打。复光当时所在的兴隆华侨农场那一派，由绝大多数华侨知青组成，属于广东“旗派”。当年海南岛没有设省，属于广东省。广东的“旗派”是始终处于在野状态的造反派。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2月20日，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成立于3月。省革委会主任是黄永胜，兼广州军区司令员。广西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8月20日，而广西各县成立革委会则比省会略早，成立于当年2月至4月。1968年7月至10月，在两广省、市、县革委会成立前后、主要的时间点是革委会成立之后，两广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风潮。这是毛泽东的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广发生这么大的事，毛泽东当然很清楚，但与一年半之前的青海赵永夫向群众开枪事件相比，中央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两广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这就是兴隆“8·2”惨案发生的大背景。

研究两广大规模屠杀事件的文革史研究者，总结出两广各地的屠杀风潮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时间上主要发生在省、市、县成立革委会之后；二是造反派（广西的“四二二”、广东的“旗派”），与其他大部分省份不同，仍处于在野状态，而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进入了各级革委会；三是大屠杀是在没有发生武斗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四是越是偏远的



农村地区死人越多；五是各级革委会普遍动用了民兵，甚至正规军；六是两广各级革委会是以贯彻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名义，实行屠杀；七是屠杀目的，在于彻底镇压“造反派”，巩固、恢复党的领导（革委会）；八大屠杀带有强烈的对造反派进行报复的意味；九是镇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为重点，从而形成恐怖氛围，此点与1966年8月的大兴事件十分相似；十是中央没有强行制止。这十个特点，解释了为何在海南兴隆于8月2日会发生惨案。

据广东省《曲江县志》记载：1968年“樟市公社发生非法杀人的严重事件。全公社有13个大队出现乱捕乱杀行为，先后有149人被杀害。”“池洞、镇隆和北界三个公社发生了大量打人、杀人的现象，死29人。”“新安公社梨桐大队活活烧死56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群众专政由各公社公安人员执行。”（宋永毅主编《文化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588页）从曲江县发生的屠杀事件，可以窥见两广事件之点滴。

1968年8月2日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农场都发生了些什么事？这段历史，有待文革史补上。

复光遇害后，复光的朋友们从兴隆来信，劝我千万不能去海南处理后事，局势很乱，去了危险。直至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1978年，我托复光好友郑文泰寻找复光遗骨并带来北京。郑文泰和几个朋友在埋葬复光遗骨的荒地，挖了三天，找到许多遗骨，无法分辨谁是谁，于是放弃。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家里没收到复光的遗骨。大约在1979年，家里收到兴隆农场场部托来京的复光友人带来的复光的几件衣服、钱包（无一分钱）、相片簿等遗物及几十元人民币抚恤金。我于1985年与郑文泰一起，从香港多次到海南岛兴隆农场做商务考察，我所在的公司当时有意与郑文泰合作，在兴隆建一个生产收录机的电子工厂（后来没搞成）。郑文泰让我不要对农场的人讲自己是王复光的哥哥，因为兴隆的派性仍很严重。但是我的身份还是传了出去。后来人们告诉我，杀害复光的凶手郭际标怕我报仇，躲到荒凉、偏远的东方农场，一躲好几年。大约在2000年时，复光原在兴隆的好友、马来西亚华侨周国宝高兴地告诉我：他一直关注郭际标的行踪，郭际标病死了。看来这个人晚年活的并不轻松。

我于1998年，从香港专程去到海南兴隆农场复光被埋葬的那片荒地进行凭吊，周国宝、郑文泰陪我去到那片荒地。我在这片荒地上挖了二瓷瓶土，含泪默哀，三鞠躬，把复光的魂灵带回北京。2000年时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了下葬仪式，把那二瓶土、复光的几件遗物、遗信一起下葬，立了一个衣冠冢。下葬时，参加仪式的复光的发小好友薛钟灵，要看看下葬的遗信，我给他念信时，情不自禁，突然爆发，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2010年在北京，我因要准备移民美国，在家里整理祖父的资料（辽宁省档案局、抚顺市档案局、九三学社主席都向我索要王卓然遗留的文字资料）。我要把资料移交给长住北京的小弟王复强（他的香港公司在北京有个办事处）。在整理祖父信件时，我发现祖父写的一张纸条，这是祖父1964年10月某日写给复光的。纸条上写：“复光：爷爷出去办事，你等着我。你要去海南岛下乡务农，好样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父、母那里可能有阻力，我会做工作。爷爷留字。”我看完字条，情不自禁，又一次突然爆发，嚎啕大哭。我赶紧关上房门，不想妻子听见，痛哭了一个小时，真是悲痛欲绝。我自己没有料到会这样反应。那年我已67岁，复光已走了42年。这时，我才深深意识到，复光的遇害，在我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那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疼。复光比我小一岁零三个月，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练游泳，一起聊形势，一起谈文学作品，一起谈将来，一起长大。他是那样单纯而又充满理想。我深感内疚，我是那么傻，竟会那么听党的

话，鼓励他远离家庭到海南岛去务农，他本来是有可能留在北京当工人的呀！结果惨遭横祸！当我写到此节此处，仍禁不住热泪滚滚。

### 1 1、批评本派错误，促进两派联合

1968年8月底，北大四年级学生纷纷毕业离校，常在一起的扬子浪、刘庆柱、张绍清毕业了。

9月1日，学校原两派头头集中食宿，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宗旨为：消除派性，清除二个独立王国，实现大联合，服从、巩固工军宣队领导。校文革的聂元梓、孙蓬一、姜同光及“公社”总部的孙月才、卢平、沈永友、李文、丁建华、宫香政、阎志胜、黄元庄等人及马云龙都被指定参加了学习班；“井冈山”的牛辉林、徐运朴、候汉青、孔繁、杨克明、郭罗基、陈醒迈、靳枫毅等人也被指定参加了学习班。同时，各系两派头头、活跃分子也在各系宿舍楼集中住宿，开办各系的学习班。我记得历史系学习班，“公社”这边有我、窦春起、朱耀庭、高海林等人。“井冈山”方面有李炳煌、徐育敏等人。老师里有吴维能、魏杞文、吴代封等人。其他人记不清了。

9月初，两派的组织虽已解散，但派性仍在。在一个星期天，我、索世晖、陈双基、任瑚琏与魏杞文串联、开会，认为有必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本派的派性，批评聂元梓、孙蓬一过往在大联合、武斗问题上的极左思想，清算他们以前的错误，从而促进大联合，巩固工军宣队的领导。魏杞文建议我们四人去找一下工军宣队领导魏秀如，汇报一下聂、孙和“公社”总部在前段运动中的错误。9月上旬一天，我和索世晖、陈双基、任瑚琏四人找到工军1宣队付总指挥魏秀如，谈了一个多小时，系统地谈了本派头头聂、孙，重点是孙蓬一，从67年底至68年7月的错误。魏秀如做了详细记录。我们谈完后，魏表扬了我们，表示我们的汇报让她详细了解了情况，有利于清除派性，促进联合，等等。

汇报完之后，我们决定贴张大字报，公开批评本派头头聂、孙打派仗、搞武斗的极左思想和极左行为。经讨论，大字报题目定为《历史的教训》。任瑚琏起草了第一稿，马云龙修改、完成了第二稿。两派头头学习班是密封状态、与群众隔绝，我是在大饭厅午饭时间与马云龙接头。魏杞文改了第三稿后，交给了宋一秀。而后魏带我去校医院看望住院的宋一秀并拿稿子。宋说，写得很好，他只加了一句话，并建议加个副题：《致聂元梓、孙蓬一的公开信》。并表示他要签名。而后我把稿子交给马云龙，马云龙征求了李文的意见，李表示同意大字报内容并签名。大约在9月12日，大字报贴在靠近大饭厅的小饭厅的东墙上。任瑚琏统一代所有相关人签了名，有宋一秀、魏杞文、李文、马云龙、索世晖、王复兴、陈双基、任瑚琏。那时校园里已没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出后，轰动全校，从早到晚许多人围观、抄记，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高声念，其他人在路灯下记。如此连续了二、三天。那几天，各系各班开会，几乎都是谈论这张大字报，许多原“公社”的同学表示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但有少数原“井冈山”的同学却用我们大字报揭露的聂、孙错误言行，攻击校文革和“公社”，而不做自我批评，不批评本派的错误，令我们十分遗憾。与“公社”相比较，“井冈山”比较缺乏自我批评，派性更顽固。马云龙告诉我，沈永友、卢平在学习班私下对李文讲，他们同意大字报内容，怎么没找他们签名？我吃午饭时在大饭厅外碰见孙蓬一，他对我表示对大字报不满，说有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有的话（如让聂反工宣队）他没讲过，等等。我只对他笑笑，没和他争论。孙月才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9月14日这一天，记载了他本人和聂元梓对宋一秀等人大字的不满，他们认为“大字报客观上为敌人破坏大联合开脱。”聂元梓想公开反击，被孙月才劝阻。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历史系工军宣队对魏杞文讲，要他准备好与孙蓬一公开辩论。魏告诉了我，我说“真要辩论，我们签名的六个学生和你一起上。”后来这个辩论会并没召开。过了几天，《红旗》杂志记者找宋一秀要大字报底

稿。魏杞文连夜用毛笔抄写了一份底稿送交“记者”，我们都明白，这是要上报中央。69年“九大”召开前，周恩来、江青找聂元梓谈话，告知她准备以代表身份参加“九大”，谈话中特别向聂元梓了解宋一秀的情况，这应是与那张大字报有关。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原校文革与“公社”内部所谓的“机派”与“孙派”两种思想长期斗争的继续与延伸。它是在文革转折时期，造反派、红卫兵进行自我批评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 1 2、惨烈的清队，翦伯赞自杀

9月下旬，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北大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约占当时全校师生总数的10%（注9）

10月16日，在清队中，对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历史进行审查，有人揪斗，有人贴大字报。16日晚饶毓泰上吊身亡、时年77岁。（注10）

10月17日，原北大党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崔雄昆，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17日晨被发现在校内红湖游泳池投水自杀身亡。时年49岁。（注11）

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被诬陷为“美国特嫌”，进行逼供，上吊身亡。时年52岁。（注12）

11月4日，笔者所在历史系原系党总支委员、系文革主任吴维能，被工军宣队点名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且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审查、批斗。吴在圆明园投湖自尽。时年41岁。

吴维能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19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1959年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说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他马上造反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委员。工宣队进校清队，翻老帐，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终没能逃过1959年之劫。

11月16日，北大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大夫，在清队中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头头，对其批斗，审问逼供。16日晨，郭用刀片自刎身亡。时年49岁。（注14）

12月10日，西语系党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徐月如（女），清队中被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攻击三面红旗”，工宣队对其日夜轮番批斗、逼供，并威胁要游街批斗。10日，徐上吊身亡。时年39岁。（注15）

以上仅列举了北大工宣队在清队的首三个月，审查、逼供、批斗知名教授及系总支委员以上干部，导致自杀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事例。在首三个月的清队中，另有五位讲师自杀，分别是物理系的廖莹、俄语系的龚维泰、东语系的汤家瀚、数力系的陈永和、张景昭（女）。（注16）

笔者所在历史系，清队中工军宣队对副系主任张芝联教授进行了立案审查。历史系的清队由618军工厂工人李杰负责，他同时是历史系的一号领导。李杰瘦高个，能说会道。6

9年初，李杰突然被解除历史系的领导职务，随后得知是因其利用清队、审查之便，向被审查的张芝联教授等人借钱，这种钱是不会还的。钱是“借”到了，但是被告发了。告发人是历史系教师范金加，原来李杰不仅是向张芝联借钱，而是向许多教师借钱。收入多的多借，收入少的少借。范金加、魏杞文、张元杰每人被李借了20元。范、魏、张三人一碰头，才知都被李借了20，理由都是“老婆病了，家里困难。”可是不对呀，怎么净看见他到南门外小饭馆下馆子呀！不久李杰又蹬门找魏杞文第二次借钱。李离开魏宅后，魏的夫人丁始琪提醒魏：“这么老借那受得了呀？再说，如果哪天有人说你腐蚀工人阶级就麻烦大了！”魏当时也在被审查。魏与范、张二人一商量，都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于是由出身工人家庭的范金加向学校工军宣队领导做了“汇报”（不敢说是“举报”）。不久，工军宣队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体工军宣队员大会，对李杰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解除了他历史系领导的职务。权力腐蚀人的效应，来得如此之快。不久传出李杰自杀的消息。

12月12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这是到1968年12月12日为止的自杀人数。（注17）北大工军宣队的“清队”扩大化一直延续到1969年3月底。1969年3月底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大，扩大化的清队工作才告一段落。而后北大进入第二次清队。第二次清队是在8341领导下进行，强调各项政策，严禁逼、供、信。

文革期间（1966年至1976年），北大非正常死亡63人，工军宣队期间死亡38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总数的60.3%。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折磨至死、武斗死亡。数字表明，文革期间，北大工军宣队对知识分子开展的阶级斗争，最残酷、最血腥。（注18）

北大清队中的自杀风潮之高峰，是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自杀。

翦伯赞是笔者所在的历史系主任、是著名历史学家、一级教授、北大副校长。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示，“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然而，在1968年12月18日晚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却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了。翦伯赞的自杀事件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他是怎样自杀的？各种版本众说纷纭。许多传说漏洞百出。我的历史系同班同学王渊涛是此事件最直接的知情人。他是在翦自杀前被历史系工宣队委派，临时配合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审查翦伯赞与刘少奇历史上的关系。王渊涛当时是从历史系大批判组临时抽调过去的。他近距离接触、观察了翦先生最后的时日。

2015年4月时，几位北大校友在北京雁栖湖聚会，谈到北大文革时，王渊涛说，许多流传着的关于翦自杀的故事，包括一些历史系师生的“回忆”，有很多想象、道听途说、很多失真。他讲述了翦伯赞最后的故事，我和大家马上意识到了它的史料价值，希望王渊涛把它写出来。此后，我曾多次要求王渊涛校友把他所知道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他在我的邀请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授权我决定如何处理、公布他的这篇回忆文章。我决定在此，把王渊涛此文，全文附录如下。

◇ 附录：《我亲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王渊涛（此处略，见本期“关于翦伯赞之死的两种叙述”）

### 13、工军宣队进校后，系里班里发生的事

从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24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大之前，这半年在历史系和一年级世界史班曾发生以下几件令我印象深而难忘之事。

一件事是，大约在68年11月，世界史二年级的朱YT（原“公社”联战派的骨干）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要揪出聂元梓的坏助手魏杞文。大字报还抛出魏的历史材料，说他在1949年是国民党军校伞兵学生兵，乘军舰撤离大陆，军舰开到太平洋起义，魏随部队起义，舰艇从太平洋开回武汉。（朱的意思这是魏的反动历史，因魏曾是国民党的学生兵，而“起义”不算正面材料而是污点。）我一看就明白了朱的意思，他的大字报是把“坏助手”孙蓬一的帽子扣到魏杞文头上，江青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孙蓬一是聂元梓的坏助手。我当时认为：朱做为孙派，这是在帮助孙蓬一抵制原公社师生对孙蓬一在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对其错误进行的揭发、批判。他是“围魏救赵”，转移视线，颠倒黑白。而朱抛出魏的档案材料，他做为学生从何而知？这是一个谜。当时刚开始清队，朱对自己世界史专业的老师贴大字报，进行诬蔑，这一做法很错误，令我十分反感。我在该大字报的结尾处，贴了一张小字报，只一行字：“坏助手抓‘坏助手’的丑剧出笼了，人们将拭目以待。”当晚王渊涛碰见我，告诉我，朱的大字报后面有个小字报，很有启发性，可能是自己人贴的。我告诉他：“是我贴的。”我怀疑朱YT的大字报是受孙蓬一指使。

过了一、二天孙蓬一亲自上阵，在大饭厅东墙贴出揭批魏杞文的大字报。大字报说“魏杞文是陆平的‘黑班底’。”（魏在文革前只是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副主任、助教、普通党员。）大字报还说魏杞文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国民党”。（魏小时家里是城市贫民，曾一度跟着奶奶、母亲四处要饭，后来随母亲投靠了地主舅舅。因舅舅不肯为魏交中学的学费，魏无法继续上中学，便报名参加了免学费和食宿费的国民党武汉空军伞兵学校的少年班。1949年魏与其他学员一起上了军舰撤退，军舰开到太平洋后宣布起义，驶回到武汉。而后魏参加了解放军。此即魏的历史问题。）大字报又说魏“是聂元梓的‘坏助手’”。（江青曾点名孙蓬一，说他是聂的“坏助手”。反对大联合，领导武斗，搞派性这些坏事明明都是孙蓬一干的，两派师生都清楚，想赖，想推，怎么可能呢！）我于2016年5月2日看望赵建文。赵告诉我，文革后他见到孙蓬一，批评老孙当年给老魏贴大字不对。孙蓬一承认了错误，说此事确实做得不对。

大约在1968年12月，系工军宣队决定重点批斗魏杞文。事前在系里的学习班上，工宣队要我重点发言（可能是认为我与魏走得近）。我暗自决定搅局，按工宣队以魏为典型的标准，在学习班向高年级学生收集了“井冈山”几个干部、教师的一般性历史问题的材料。全系批判大会在大阶梯教室召开，我坐在第一排。会议一开始，系工军宣队领导李杰点名魏杞文，厉声让他站起来。我心想，好吧，我就按你们工军宣队的整人标准，利用“公社”的派性，压压“井冈山”的派性，将来有什么问题是你们工军宣队指导的。我站起来第一个发言，首先要求魏杞文揭发孙蓬一是怎样反对大联合并指挥武斗的，孙蓬一是怎样给聂元梓出坏主意，怎样当坏助手的？然后话锋一转，陆续点了原“井冈山”干部、教师七、八个人的名字，揭发他们那些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每点一个人名，原“公社”一派的学生就一片吼声，叫某某人站起来。我发完言，会场上站着八、九个人，魏老师的表情轻松了许多。会后工人师傅说，“今天的批判会开得好，火力很猛啊！”我当时这样发言，一是为了反驳朱YT对孙蓬一的袒护；二是为了打击一下“井冈山”的派性；三是为了保护魏老师。

到了1969年3月底，8341进校，发动群众总结前一段运动，师生们纷纷批评工军宣队违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清队扩大化。在我们历史系全年级会议上，同班的李延岑批评我在那次批判会上，是拿着冲锋枪（李用双手表演托着枪扫射的样子）嘟、嘟、嘟，打击一大片。我当即对他微微一笑，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检讨了自己在工军宣队指导下犯了错误。并指出工军宣队以魏杞文为清队的批判典型，势必扩大化，自己是跟着工军宣队走而犯

了错，并向被我点名批判的几个老师道了歉。我发言时指出，工军宣队是以极左思想对待知识分子，打击一大片，清队扩大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再一件事，大约是在11月时，一次开完班会后，同班同学陈RF拿着一张报纸，向历史系工军宣队负责人李杰检举同学徐森有写“反标”的“现行”罪。证据就是他上交的那份《人民日报》。那张报纸上并没有毛主席像，开会时徐森在报纸上练毛笔字，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几个字，不是一行行写，而是东一个字，西一个字。根本构不成什么所谓的“反动标语”。可是系工军宣队召开全系大会，李杰宣布徐森有“现行罪”

（即“现行反革命罪”），要批判。于是我们班召开了批判会，和徐森要好的我、张文虎、王渊涛、俞政都不得不表态。我们几个发言，都是小骂大帮忙，批评徐森骄傲自满，不注意改造思想，不谨慎，开会时思想不集中，乱写乱涂，云云。绝不上纲上线且为他开脱，也绝对不揭发什么新问题。事情拖了下来，工宣队没证据给徐森定罪。

事情后来发生了转折，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小型班会上。那个小会，没让徐森本人，也没让我、王渊涛、俞政、张文虎参加，也没让为人正直的班长高发元参加。但却让徐森的女友杨桂香（印度尼西亚华侨）参加了。工人张师傅、陈RF等人叫杨桂香揭发徐森。杨桂香很勇敢，她当场反击：“陈RF陷害徐森，因为他有目的。他追求我，我没接受。他多次请我和他一起去下饭馆，我没去。他说他每个星期都下馆子吃甲鱼。他有问题，甲鱼很贵，每个星期吃，他从那儿来的那么多钱？”杨桂香一条一条揭发，有时间，有地点，有陈的原话。结果会议反过来成了批评陈的会议。陈毫无思想准备，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杨桂香的指控。原来与陈要好的罗志刚发言说，“陈RF，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此会议扭转了局势，徐森案翻了盘。

过了不久，告密者陈RF自个儿却出了事。他因偷东西被抓住了。工军宣队领导在全系大会上批评了他。我在班里讨论工军宣队讲话时发言：“平常觉得陈RF是个大左派，每次发言挺左的，挺能说的，没想到工人师傅说他是‘小偷的干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则垂头丧气。我出了一口气。

陈同学个头不高、精瘦、福建人、家庭出身工人阶级，样子很机灵，每次开会总是夸夸其谈，跟风很快，发言很左。我们背后称他为“投机分子”、“小瘪三”，觉得他在文革中吸收了一些坏意识，总想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

还有一件事，大约在12月底、1月初时，一天傍晚，我在五四操场跑步锻炼。中文系的马西沙神情紧张地把我叫住，告诉我，他正到处找我，他听历史系二年级张文泉说，“王复兴同班同学鄢成林向工宣队揭发，王复兴写反动日记。”马西沙担心哥们儿出事，向我通风报信。我告诉马西沙：“放心，没事儿！我根本不写日记。”我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写日记给戒了。鄢成林这样搞完全是莫须有。我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我平常和鄢说话不多，偶尔也会聊天。他个子不高、矮胖、四肢短粗、小平头、皮肤白皙、满脸红光。每天开班会时，他都盘腿坐在床上，光着脚丫，揉脚心（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涌泉穴），很懂养生之道。他是工人子弟，父母是河南卷烟厂工人。我曾听他本人说在文革中他看了很多书，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当时正和我们班一个女生叫米树荣的谈恋爱。米家庭出身是中农。

1969年初北大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凶手是鄢成林，受害人是米树荣。事情经过是这样：俩人搞对象，但后来米树荣对鄢成林改变了态度，劈腿，把他甩了，改为与一位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相恋。鄢气愤之极，忍受不了米把他看低，另攀高枝。一天晚上，鄢约米到圆明园谈话。鄢的最后谈判失败，于是失控。鄢用石头砸米的头颅，把米给生生砸死了，脸部

血肉模糊，无法辨认。鄢成林半夜回到北大38楼宿舍，换掉了沾满血迹的衣服，对同屋被吵醒的同班同学李垂黑说，“我上山打游击去！”后来公安在米树荣的裤兜里发现了北大第一食堂的饭票。于是公安到北大对在北大第一食堂吃饭的中文、历史、西语等系的女生进行排查，看谁失踪了。发现历史系女生米树荣不见了，对照她的身材、肤色等体型特征，很快断定死者是米树荣。因鄢成林也同时失踪了，两人又谈过恋爱，于是鄢成为嫌疑人。公安带着警犬到38楼鄢的宿舍闻了鄢的衣服、被褥。警犬很快找到了被鄢扔掉的血衣，接着很快便抓住了凶犯。

不久，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击坏分子、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万人大会上，鄢成林被公审，被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判决鄢成林及其他多名罪犯的公告便贴满了全北京城。我们班开学时有25人，毕业时变成了23人。

毕业后我常想，文化革命似乎是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活了，根源可能在于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整人、斗人甚至害人成了一种正面的价值观。从而激活了某些人的人性中的狼性。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学雷锋，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要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结果怎么样？文革过了二年半，我们班出了个鄢成林。如果没有文革，他或许不至于因杀人犯罪而断送小命，由一个北大学子沦为死刑罪犯。

#### 14、8341部队进驻北大

1969年3月24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8341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是进入北大的重要成员。8341的领导和原工军宣队领导刘信、魏秀如等人，共同组成北大领导小组。当时毛泽东通过8341直接掌控了六厂二校，做为指导全国开展斗、批、改的试点。二校即北大、清华。北大的实际领导当然是8341，日常工作由王连龙、迟群、谢静宜负责。

历史系来了三、四个8341的军人。有个8341的和我聊天，说“谢静宜是通天人物”。为什么王连龙、迟群不通天？只有谢静宜才通天？几十年后看了李志绥的书，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有一次在哲学楼我碰见谢，她白净、苗条、俊秀，很精神。看样子挺干练。

3月31日，8341以工宣队名义召开全校大会，开展“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活动。这个活动的实质是纠偏，纠前段清队扩大化之偏，纠自杀了那么多人的运动之偏（68年12月12日之前清队中已自杀了17人）纠令翦伯赞自杀的政策之偏（据说翦的自杀令毛泽东十分震怒）。虽为纠偏，但很照顾原工军宣队的面子，叫“总结经验”。各系开大会、小会时，师生们尖锐批评工军宣队在前段清队中过左的表现，违背知识分子政策，大面积整人，逼死许多人。我在历史系也多次发言批评原工军宣队。我记得历史系有个姓范的老师发言说，“工人阶级领导应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并不是说只要是个工人说得就一定对。我老婆就是个工人，她在家就得听我领导。”5月12日，8341在上报的工军宣队《简报》中，总结前一段清队工作，批评了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挂勿放的错误倾向和对专案工作“不调查，不作具体分析，凭主观臆断的坏作风。”

大约在4月，我、索世晖、任瑚琏、陈双基四人串联并找魏杞文商议后，觉得孙蓬一及原“公社”的部分人派性很顽固，与他们的思想斗争不能停止。于是商量找迟群反映情况，批判聂、孙，特别是孙蓬一在大联合和武斗中的错误。我和索、胡、陈四人找了迟群，谈了

一个多小时，迟群快速记着笔记，不时发问。谈完后，迟群表示感谢我们反映的原本派的情况，希望我们回到系里继续发挥作用，做大联合的促进派。过了几天，中文系8341领导找索世晖，让他在全系讲用会上作批判派性的专题发言。索讲了45分钟，反映很热烈，很正面。

4月底，北大组织了第一支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小分队，进驻新华印刷厂。历史系领导派我去参加了这支北大文科教革分队。

#### 15、反思我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

本人在文革初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那理想主义的基础却是毛泽东的虚幻的乌托邦梦想。在文革初期，自己走的是一条狂热追随毛泽东的“革命之路”，是一条“左倾”之路，是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之路，是一条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以“五七指示”为蓝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之路。我自以为这是政治正确，能够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这种状态在1966年至1967年初尤甚。当年反陆平党委，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参加一月风暴，炮打刘邓司令部，捍卫中央文革，一度和校内对立派开展路线斗争打派仗，在这些活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直到1967年3月以后，面对乱局产生疑惑，自己才开始警惕极左思潮，基本立场从反右转向反左，开始慢慢醒悟。但仍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跳出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回想1967年6月以后，“公社”和“井冈山”两派虽然斗的一塌糊涂，但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及打倒刘邓等大的原则问题上高度一致的，没有分歧，都是政治不正确，两派都错，但当年自己在主观上认识不到这一点。从1967年底至1968年底，由于自己对旷日持久的打派仗及武斗越来越反感，逐渐淡出了运动，成了半个逍遥派，参加运动的主要内容转变为抵制和反对本派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打派仗搞武斗的左翼强硬派，力争大联合和制止武斗。本人的思想直到七十年代，受了三次大的冲击：即九一三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倒台，才逐步大彻大悟，再也不想受毛的忽悠，抛弃了毛的主义，转而追求普世价值。

注释（第六章）：

注1：扬子浪《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相关日期。

注2：同上注1。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5页，第十章第1节。

注4：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231、232页。

注5：《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60至264页，第十三章第7、8节。

注6：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968年3月25日条目。

注7：《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348页。

注8：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968年9月14日条目。

注9至注17：《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每注相关日期条目。

注18：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第一次印刷。

注19：王渊涛该文曾由他本人以《我知道的翦伯赞之死》的标题全文刊发于2015年1月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